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中共广东省委中級党校資料室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

#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 論反对右傾机会主义

中共广东省委中級党校資料室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  
論反对右傾机会主义

中共广东省委中級党校資料室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南路43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記証專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书号: 1899·850×1168#1/32·6 1/4印張·143,000字  
1959年12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0,101—250,190

統一書号: 1111·1

定 价: (4)四角七分

## 編者說明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非常英明而又及时地指出了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并号召各级党委要坚决地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言论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为了配合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帮助同志们进一步领会八中全会的精神，我们特将毛泽东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根据当前学习的中心内容，摘录編輯成“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书。

本书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論反右倾”、“論階級斗争”、“論不断革命”、“論党的领导”、“論反对个人主义”和“論无产階級世界观和资产階級世界观的斗争”七个专题。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内容，因此，我们把“人民日报”发表的侯永、王愈明同志所选編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編入本书，以方便读者的学习研究。其余六个专题我們所选輯的材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們有关这些方面的与我們当前的学习关系比較密切而且比較重要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其中，关于“論不断革命”的问题，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和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工作报告”、“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两文，都有过极重要和极深刻的論述，因此，本书在“論不断革命”一题也将其有关論述的重要部分，一并輯录在內。

我們所選輯的六個專題，除“論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一題外，其餘五個專題出版前曾先後在我校編輯的“學習資料”刊載過，這次出版，無論在內容選擇上和在編排上都作了較大的刪添和更改。材料的次序是按作者寫作的時間排列的。由於我們的水平所限，加之時間倉促，不妥和遺漏的地方，在所難免，請讀者批評指正。

1959年12月

## 目 录

|                           |     |
|---------------------------|-----|
|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 | 1   |
| 論反右傾 .....                | 23  |
| 論階級斗争 .....               | 46  |
| 論不断革命 .....               | 69  |
| 論党的领导 .....               | 96  |
| 論反对个人主义 .....             | 132 |
| 論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 | 157 |

##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 革命的群众运动

**原編者按：**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問題，从来是馬克思主义者和反馬克思主义者爭論的根本問題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設中，这同样是一个根本問題。

为了帮助讀者了解历来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对这个問題的观点，駁斥右傾机会主义者对群众运动的污蔑，我們选录了两部分材料，一部分是毛澤东同志的論述，一部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論述。

馬克思主义者从来非常尊重群众的革命的創造性和主动性。正如列宁所說的，馬克思“最重視的是工人阶级的奋不顾身积极創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馬克思主义者嘲笑资产阶级的这种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軟弱性和反动性。馬克思說：“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鈍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不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或在建設中会遇到某些曲折和困难的，这是前进中的曲折和困难，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力量，就可能迅速地加以克服。资产阶级的仆从們，譬如我們现在的右傾机会主义者，絲毫沒有这种馬克思主义的态度，絲毫沒有克服困难的信心，而且对于我們

事业发展中的某些困难譏諷嘲罵。列宁說得好：“对轉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禍，散布惊慌情緒，宣传开倒車，——这一切是資产階級知識分子进行階級斗争的工具。无产階級是不会让自己受騙的。”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就指出了对群众运动的三种不同的态度：“站在他們的前头领导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評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对待群众运动，仍然有这三种不同态度的人。毛泽东同志坚决地反对把群众运动看成“糟得很”，而热烈地歌颂群众运动是“好得很”。毛泽东同志所說的这个真理永远不会过时。有的人之所以跌到右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面，他們之所以倒霉，就因為他們不愿意相信这个真理。

## 第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的論述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問題。很短的时间內，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驟雨，迅猛异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們将冲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决定弃取。站在他們的前头领导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評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項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紳士們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风雨的議論的压迫，他閉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沒有法子否認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說：“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則是糟。”总而言之，無論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認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們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內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二版，第13、16—17頁）

……我們的代表大会應該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細心地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組織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錯誤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

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二版，第1096—1097页）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

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一）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二）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

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对。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决。但是，不应当將这些看成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个五年計劃时期內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毛澤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1955年。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0、12、18、21頁）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來說可以在三年內实现初級形式的合作化的人們（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評），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們，請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吧！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許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嗎？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認輸一法。群众中蘊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們，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时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們遇見得还少嗎？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們，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計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現，他們总是不贊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認輸，做一点自我批評。第二种新事物出現，

他們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動，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經驗，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傾頑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們不妨試一試。

（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7—588頁）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貧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內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憤怒斥責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貧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頂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勝負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經過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會議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烏烟瘴气，阴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戶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編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經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戶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

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毛泽东：“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9—730页）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毛泽东：“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4页）

## 第二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

……诚然，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

民众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1851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313頁）

如果你讀到我底“拿破侖第三政变記”底最末一章，你就可以看見我說了这样的話：法国革命底下一次的企图，不再是象从前一样，把官僚主义的軍国主义的机器从一手移轉于它手，而是要把它打碎；这是欧洲大陆上每一真正民众革命底先决条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党的同志們所企图的，就是如此。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机动能力，何等的历史的創造力，何等的自我牺牲的能力呵！經過了六个月的飢餓与破坏之后造成飢餓与破坏的，与其說是国外的敌人，不如說是国内的叛变，他們，在普魯士的刺刀下面革命起来，好象法国与德国沒有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不在巴黎門前似的。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象这样伟大的例子。如果他们归于失敗，那只是由于他們底“寬容的性質”。在最先維諾衣，后来巴黎国民軍底反动部分，都敗退到凡尔賽之后，他們應該立即向凡尔賽进军。由于良心上的躊躇，他們丧失了时机。他們不愿发动国内战争，好象那恶毒的妖物梯亥尔还没有因企图解除巴黎武装而把内战发动起来似的。第二个錯誤：中央委员会为要讓位給公社，而把权力放弃得太早。这又是由于“太过端正”以至流于疑惧！虽是如此，这一次的巴黎起义——即使它被旧社会底狼、猪和恶狗們所压倒——还是我們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的最光荣的行为。将这些巴黎底“翻天覆地”的英雄們，与德意志普魯士神圣羅馬帝国（它帶有染着兵营臭味、教堂臭味、士官貴族臭味、尤其是庸人臭味之因袭的假装）底順天的奴才們比較

一下吧。

（馬克思：“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1871年。“法蘭西內戰”，解放社1949年版，第107—108頁）

至于我們，那末根据我們的全部过去，摆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在差不多四十年間，我們一直是最重視階級斗争，認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別是最重視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間的階級斗争，認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杠杆；所以我們决不能去和力求把这个階級斗争从运动中勾銷的人們一起行走。在創立国际时，我們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去和公然說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程度来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慈善主义的大小資产者一手从上面解放出来的人們一起行走。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內西、威·布拉克等人”，1879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485—486頁）

革命是历史底火車头，——馬克思这样說过。革命是被压迫者与被剝削者底盛大节日。民众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如革命时期这样能表现为新社会制度底积极創造者。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儈漸进主义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議的奇迹。但在这样的時候，必須使革命党底領導者也更廣闊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任务，必須使他們的口号始終能发扬群众底革命自动性，成为他們的灯塔，表明出我們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底全部伟大与全部光采，指明出达到絕對完全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首先且壯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問題吧。如果我們不

利用群众这种异常兴奋的毅力及其革命的热情来为直接坚决道路进行无情而奋勇的斗争，那我们就会成为叛变和出卖革命的人了。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05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654—655页）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

“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而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对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俄国革命浪潮达到顶点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便马上扮作悔过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愚蠢举动。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不需要动用武器”。

当他在9月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变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敌人，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